

論戰模式的歷史建構與國際關係理論^{*}

林挺生

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政治系副教授

摘要

國際關係研究經常用一系列論戰的方式來論述其歷史，但是這樣的敘事模式充滿爭議。本文將從論戰歷史切入，採用知識社會學與思想史的方法進行分析。接著回到 1954 年國際政治理論研討會的記錄，探討現實主義者對學科獨立性與專有理論的看法。最後連結 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來理解關於理論的本質問題。

關鍵詞：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場域、語言—行動、科學哲學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諸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壹、前言

從學科發展的制度層面 (institution) 而言，國際關係研究是一門新興的學術領域：第一個國際政治研究講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 1919 年才在英國 Aberystwyth 的 University College of Wales 成立 (Schmidt, 2002: 4)。若由思想傳承角度來看，國際關係學者又常將學術傳統上溯到更早的思想家，如 Thucydides、Machiavelli、Hobbes、Hume、von Clausewitz，彷彿與國際政治相關的思索從來就是人類文明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Clark, 1989; Donnelly, 1995; Holsti, 1985; Kugler, 1993; Schmidt, 2002; Zacher & Matthew, 1995)。廣為國際關係教科書採用的一套國際關係研究「發展史」，是以一連串深化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術論戰 (debates) 為基礎的敘事模式 (narrative)：國際關係研究的主要概念內涵與研究方法，在這些論戰中得到充分討論與檢驗，得以更加精確與科學化，而能適切地回應外在世界 (研究對象) 的劇烈變化 (Baylis, et al., 2011)。

這種明顯帶有線性進步史觀的敘事模式，由於清晰扼要容易理解，又能將相互對立理論觀點之間的爭議簡化地二分之後加以呈現，似乎是可以輕鬆上手的分析與教學工具，也因此成為主流的論述形式。但是這套以論戰為主軸的學科歷史也招致了嚴厲批評，認為對論戰的過度重視，妨礙了學界對真正的理論進行評估與釐清，並誤導學者陷入大而無當、定義不清的所謂「典範」(paradigm) 混戰之中 (Hellmann, 2003; Puchala, 2002; Waltz, 1997)。然而，更嚴重的問題還在於與論戰相關的陳述並沒有確切的事實基礎，將根本不存在的「論戰」建構成國際關係理論發展過程中的核心事件，究竟有何意義？對這個學術領域造成了什麼影響？1990 年代以來，一些被稱為「修正主義」(revisionist) 的學者 (Guilhot, 2015)，開始有系統地重建國際關係研究的學科歷史，企圖由前三次論戰著手，以知識社會學 (sociology of knowledge) 與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的方法，反思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過程。此類研究計畫當然不只是受到某種特殊歷史癖好影響產生的「尋根式」知識消遣，它的重要性在於揭示幾乎已被這個知識社群成員所遺忘的初衷：國際政治研究需要的是何種理論？在接下來的

章節中，本文將先從關於國際關係研究論戰的批評開始討論；接著針對現實主義在 1950 年代將國際關係研究建構成一門獨立學科的過程，分別進行知識社會學與思想史兩個取向的分析；最後回到「理論的本質」這個最初也最易產生誤解的問題。

貳、理論論戰與國際關係研究發展

即便對發生時間、實際內容、以及參與各方未有一致看法，在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術社群之內廣泛流傳著一種「三次論戰」的歷史敘事。這三次論戰分別是「理想主義／現實主義」（idealism / realism）、「傳統主義／行為主義」（traditionalism / behavioralism）、「典範之間的論戰」（inter-paradigm debate）¹。據說這三次論戰形塑了今日國際關係研究的風貌，接下來讓我們逐一進行討論。

被許多學者視為確定當代國際關係研究為一門獨立學術的第一次論戰，發生於理想主義或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與現實主義這兩個涇渭分明的思想陣營之間。這個被 Miles Kahler（1997）稱為國際關係研究「奠基神話」的第一場論戰，是在兩次大戰之間開始的，由現實主義者所發動，對一戰結束之後佔據主流地位的理想主義者所推動的和平主義運動、國際法研究、以及以國際聯盟為主的國際組織進行的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則以更長的交戰時間，更為殘酷的殺戮，殆無疑義地「宣告」了理想主義的破產，以及現實主義的「優越性」。

Schmidt（2002）以及 Quirk 與 Vigneswaran（2005）都對這個論戰的敘事模式存疑。以現實主義前鋒的角色對理想主義發動攻勢的是 E. H. Carr

¹ 由於關注的焦點不同，關於論戰的「名稱」學界也沒有共識：「理想主義／現實主義」有時也稱為「烏托邦主義／現實主義」論戰；「傳統主義／行為主義」也被視為「傳統主義／科學（實證主義、經驗主義）」論戰；「典範之間的論戰」則更複雜，有「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理性主義／反思主義」、「理性主義／建構主義」論戰等等。此處的「典範」主要是採用 Kuhn（1970）的概念：它代表一個特定社群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技術等構成的整體；它也可以指涉一種對具體問題的解答，可以替代規則做為常態科學其他難題的解答基礎。

在 1939 年出版的《二十年的危機，1919-1939：國際關係研究導論》（*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書，在此書中 Carr 首先將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視為截然二分且對立的概念範疇（Carr, 1939）。Carr 批評了從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家到當代的外交家，將這些人都歸類為烏托邦主義者，並質疑他們關於「國際間的衝突來自錯誤的觀念，只要矯正這些錯誤觀念即可消弭衝突」的宣稱。但這些僅僅是 Carr 個人的單向批評，不但被 Carr 視為烏托邦主義者不同意他的武斷歸類，兩造之間也從未發生「質疑／回應」的互動（Waever, 2011: 105）。「大論戰」（great debate）這個詞彙的使用則要到二戰後的 1952 年，當 Hans Morgenthau 與 Frank Tannenbaum 公開爭論何謂國家利益時，才突然出現在兩人的文章之中（Quirk & Vigneswaran, 2005: 98）。兩者都強調這個「大論戰」的重要性，即使兩者對重要性之所在有不同認知。就實際發生的狀況而言，可以說是 Carr 建構了一個子虛烏有的理想主義「陣營」做為現實主義的對立面，而 Morgenthau 則創造了一個從未發生過的「論戰」，並成功地使國際政治研究圈內成員相信這個事件的重要性（Waever, 2011: 105）。

在 1954 年由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所贊助的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研討會中（下一節將深入介紹），以 Morgenthau 為首的戰後第一代現實主義者，用充滿勝利者自信的語調提及這場論戰，他們深信現實主義已完全勝出並取代了理想主義，成為國際關係領域「唯一」的代表（Guilhot, 2011: App. 1）。然而，危機似乎未結束。召開這個研討會的目的，是要思考如何確立一個以現實主義為核心的國際關係學科之正當性與獨立性，而現下可能危及這個目標的威脅正以排山倒海之勢襲來²。這個實力堅強的當面之敵，就是在美國社會科學界摧枯拉朽的科學實證主義（scientific positivism），更精確地說，就是正在進行中的行為主義革命。可見，第一代現實主義者宣稱「我們」就是唯一的國際關係研究之際，事實上處於隨時可能被行為主義兼并的恐懼之中（Guilhot, 2011; Waever, 2011）。

² 此處或許用「反撲」一詞更為恰當，因為二戰前理想主義的哲學基礎與科學實證主義共享某種啟蒙時代以來樂觀的理性主義信仰。

如此一來，第二次論戰的實際開端，就不是約定俗成的 Morton Kaplan 於 1966 年發表於《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的〈新的大論戰：國際關係研究中傳統主義與科學的對抗〉（*The New Great Debate: Traditionalism vs.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文，而是遠在 1950 年代初期便出現在學術圈的行為主義狂潮所引發的危機感。Kaplan 在文章中並未討論「舊的」大論戰的內容，但在此文被收錄到合集中出版時，由編者 Klaus Knorr & James Rosenau（1969）執筆的介紹序文中，首次進行了較為詳盡的比較。他們用「早期論戰」（*earlier debate*）一詞將 1939 到 1960 年間的國際關係著作含括在內，並列出了這一論戰的主要參與者。其後 Arend Lijphardt（1974）發表的〈國際關係理論：大論戰與次要論戰〉（*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Great Debates and Lesser Debates*）一文中，則界定第一次論戰從 1930 年代開始，持續到二戰結束之後的十年之間。Lijphardt（1974：20）認為第二次論戰（當時正在進行的論戰）才具有實質的重要性，「因其涉及了典範的轉換」（Quirk & Vigneswaran, 2005: 100-101）。鼓吹所謂「科學取向」的行為主義者批評，傳統主義的國際關係研究中「權力鬥爭來自人性」的理論預設，以及使用歷史案例為主的研究方法，阻礙國際關係研究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即便這場論戰使國際關係研究社群分裂成兩個陣營：其一為以國際政治為研究對象者；另一則以社會科學之間的整合為目標。一般的看法是，這場論戰通過科學研究方法的廣為接受，促進了學科領域之內的科學認同（Schmidt, 2002: 11）。

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在進入 1970 年代之後出現巨大變動，現實主義典範的解釋能力不斷受到質疑，而從 1980 年代初期開始，在現實主義、多元主義、與結構主義之間展開了第三次論戰：典範之間論戰（Schmidt, 2002: 11）。與前兩次的論戰敘事相比，這個至今仍在進行中的論戰更缺乏共識，從論戰的發生時間到爭議的主題，甚至對參與論戰的各造都眾說紛紜（Waeber, 1996, 2009）。Schmidt（2002: 15）因此認為，第三次論戰存在差異如此巨大的各種版本這一點，適足以證明論戰敘事模式確實是具有嚴重缺陷的論述架構。

在此我們將避免捲入還存在爭議的內容，僅就第三次論戰文本中關於

先前論戰的歷史敘事部分加以考察。Ray Maghroori (1982) 試圖對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論戰加以整理，他提到的第一次論戰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間的爭論，而他所明確援引的文本只有Morgenthau於 1948 年出版的《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但他卻宣稱Morgenthau在兩次大戰之間投入了這場論戰。至於Michael Banks (1984) 則視前兩次論戰為國際關係研究領域「正統」學說的重大轉型期，但他僅簡短地描述了 1939 年Carr對烏托邦主義的批判，就將第一次論戰設定為兩次大戰之間的學術事件。Yosef Lapid (1989) 雖然在第三次論戰的性質上與前兩者看法不同，但他卻完全接受其對前兩次論戰的論點並加以援引。自此，許多學者都直接接受這套敘事模式的編年順序，而第一次論戰就因此被「不正確」地安排在兩次大戰之間。至於理想主義則被「合理地」塑造成對一戰殘酷殺戮的直覺反應：國家政策應明確揚棄以戰爭為工具；必須建立國際組織來維持國際秩序；用集體安全 (collective security) 來取代權力平衡。弔詭的是，這些學者顯然忽略了所謂的理想主義者並沒有公開發表的學術作品來支持或鼓吹上述觀點的事實。1980 年代掀起第三次論戰的這些學者，不僅草率地將Carr與Morgenthau著作中單向的批判任意地擴張為言之鑿鑿的論戰，為了配合理想主義思潮流行的時間而將論戰人為地設定在兩次大戰之間，使理應高度嚴謹的歷史敘事成為虛構的創世紀神話。更嚴重的是，為了神話建構所需的「我者」與「他者」之兩極化，這些學者不僅誇大了理想主義／現實主義二元對立的程度，將第一次論戰描述為壁壘分明的決裂，更刻意對Carr本人在書中所表達的某種折衷調和的態度視而不見 (Quirk & Vigneswaran, 2005: 96)。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當下正在進行的第三次論戰，而非忠實地重構過去的史實；透過學科歷史的重新書寫 (刻意側重或忽略特定內容)，為目前的議題爭論創造正當性。這就是Schmidt (2002: 8) 所謂「輝格史學」(Whig history) 的「當下主義謬誤」(presentist fallacy)³。

關於以論戰為主軸之學科史敘事模式的主要缺陷，Schmidt (2002: 12) 總結道：第一，無中生有地創造了在現實中未曾發生的第一次論戰；第二，

³ 關於對「輝格史學」的評論可以參考 Butterfield (1959)、Guilhot (2015)、Stocking (1965)。

刻意突出二元對立的論戰模式未能公正客觀地評價實際發生的爭議；第三，當學界的焦點僅集中於這三次論戰時，其他同等重要的爭論則持續被忽視；第四，用一系列論戰為主軸來考量國際關係領域的發展是一種保守主義的立場，因為它創造了這個領域存在某種程度的一致性與共識的印象，然而實際上卻遠為分歧與多元。持平而論，任何一門新的學科，或學科內的一個新的典範或研究取向，都得經過一個批判先行者的階段來確認自身價值、優越性，甚至建構基本的認同。這個可以「突破期」稱之的階段，是場域(*field / champ*)內外各種力量交互激盪的時期(Bourdieu, 1976)，不僅奠定與設置了研究的核心主題與概念、場域的疆界，更形塑了學科的「性格」：亦即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週期性出現的理論論戰。為了理解「論戰性格」如何主導了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與這個社群內成員如何習以為常地用論戰架構來界定學科發展的動力，我們有必要深入討論其始作俑者Morgenthau，這將我們引向了1954年的洛克菲勒研討會。

參、1954年洛克菲勒研討會：現實主義陣營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關係研究的作品快速增加，但在Morgenthau等現實主義者眼中，這門新興的學術領域需要更清晰明確的發展策略，而能夠支撐這個發展策略的，則是一個嚴謹的國際關係理論(Guilhot, 2011: Appendix 1)。1954年5月，任職於洛克菲勒基金會社會科學部的Kenneth Thompson(Morgenthau的得意門生)，籌辦了一個以現實主義者為主的重要會議：國際政治理論研討會(Conference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這個為期兩天的研討會，成為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發展的重大關鍵事件，啟動了該學派在洛克菲勒基金會資源挹注之下穩定的制度化發展。由於這個研討會召開時採取不對外公開的形式，除了Thompson(1955)在隔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以間接方式提及了會中部分發言內容外，過去幾乎無人對這個研討會的重要性有所認識。研討會逐字稿記錄一直躺在基金會的檔案室中，直到它成為一群年輕學者在2007年舉辦的研討會材料後，

才得以重見天日並引發了一輪深度的討論 (Guilhot, 2011)。⁴

在這些出色的討論中，以 Nicolas Guilhot 為代表的取向，是從知識社會學角度出發，嘗試分析國際關係研究這個新興學科做為一個場域形成的過程。Guilhot (2011: 129-30) 強調，一個特定的理論建構行動，目的在於建立明確的分界線，以解決學科之間或之內 (次領域間) 既存的領域衝突。從較大的美國學術脈絡來看，政治學是否具有科學正當性的問題，是二戰之後整個社會科學界重要的爭議焦點。這些爭議主要集中在兩個主題上：價值的角色與政治的理性。二十世紀以來，美國學術圈的主流觀點強調，科學研究必須由不受價值偏好干擾的實證主義、理性推論與客觀主義 (objectivism) 來完成；只要嚴格遵守科學的判準，真理的追求是可能的。但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科學與技術被用來進行大規模的破壞與殺戮；二戰之後在冷戰架構下的意識形態對抗，則正在將世界分裂成兩個敵對陣營，這些都直接挑戰了樂觀的科學理性主義 (scientific rationalism)。人們發現，將倫理與規範等價值因素排除在關於科學的討論之外，可能導致極為危險的後果。與政治的理性相關之問題，則與政治的主體有關：政治做為一種人類活動是否可能是理性的？這個問題涉及對理性與權力之間關係的探索。權力的存在，使得對政治的研究難以套用行為主義的科學量化方法，因為權力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強制，它還包括心理與情緒上的作用，使得「理性地」理解與分析權力關係幾乎不可能。同時，在二戰之後的美國學術圈存在一種特定的偏見，將任何與權力有關的政治研究等同於產生納粹極權政治的「德國式政治觀」 (以 Carl Schmitt 與 Gustav Ratzenhofer 為代表)，進而被視為遠離了自然科學的判準，退化成觀念論 (German idealism) 的空想，是所謂「反動的德國浪漫主義」 (reactionary German romanticism) 的遺毒 (Guilhot, 2011: 134-37)。

國際關係研究隸屬於廣義的政治科學之下，也深陷圍繞著上述兩個主題而進行的爭論中，研討會的發言記錄翔實地反映了這個現象。然而，與會的國際關係學者 (都是現實主義者) 投入這些爭論時，卻是處於對國際

⁴ 1954 年研討會的逐字稿以附錄形式收錄在 Guilhot (2011) 主編的論文集集中。

政治研究這個學科身份 (identity) 的不確定性中，這也直接導致 1954 年的研討會未能達成預定目標：建立一個統一的、專屬於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學術立場⁵。Guilhot 抓住了這個身份的不確定性，精采地分析了與會者如何因為認識到國際關係研究對一套全新研究取向的迫切需求而聚集在一起，企圖追求理論的自主性；又如何因為看待自身學科與相鄰學科之間關係的立場差異而產生分裂。造成分裂的主因，就是第二次論戰的主題：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之爭。

在研討會進行中產生對立的兩造分別代表這兩個不同的取向：Hans Morgenthau 堅持傳統主義的歷史研究方法，Arnold Wolfers 則顯示出對行為主義方法的認同。Guilhot (2011: 152) 認為此時已經不是在辯論關於政治的「理論」(theory of politics)，而是一場圍繞著理論的「政治」鬥爭 (politics of theory)。Wolfers 認為討論國際關係是否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沒有太大意義，重點應該放在思考如何將社會科學中既有的資源更有效率地用來進行國際事務的研究。相反地，Morgenthau 對行為主義完全不信任，強調若任其侵入國際政治研究的領域，與權力政治相關的研究議題將永遠失去正當性。這絕不表示 Morgenthau 想讓國際關係理論比行為主義更加科學，而是要盡一切努力讓這門學科對「特定類型」的科學免疫 (Guilhot, 2011: 150)。這樣的分析，的確讓我們得以從建立一門獨立學科所必然牽涉到的場域邊界劃定，與場域內外諸般力量之間互動的角度，更深入地發掘出結構與過程的社會學式洞見。但也正是由於 Guilhot 這種外在脈絡取向的限制，導致他無法解釋為何 Morgenthau 意圖建立的理論竟顯得如此片斷而又欠缺同質性 (在研討會的發言與正式出版的著作皆然)。

Ole Waeber 則以「語言－行動」(speech-act) 分析來從思想史的研究取向彌補了知識社會學未盡之處 (Waeber, 2011)。Waeber 的分析事實上也是從社會學層面切入，但他與 Guilhot 的 Bourdieu 式場域分析不同，而

⁵ 出席這次研討會的學者與外交事務專家，已事先經過 Thompson 篩選，都是立場鮮明的現實主義者，包括：Robert Bowie、Dorothy Fosdick、William T. R. Fox、Walter Lippmann、Hans J. Morgenthau、Reinhold Niebuhr、Paul H. Nitze、Don K. Price、James B. Reston、Dean Rusk、Kenneth W. Thompson、以及 Arnold Wolfers。

是借用了 Randall Collins 的方法論 (Collins, 1998)。Collins 以三個層次研究理論的發展。首先，理論是由與其最密切的社會環境 (social setting) 所塑造的，這個環境的核心不是個人，而是「對話」 (conversation)。推動對話發生的動力很少直接地指向外部因素，而是針對領域內特定的個人與他們的理論。其次是組織性的基礎，如大學、出版社、教會，以及其他提供物質資源的機構。第三層是支撐學術組織的政治經濟結構。來自這個結構的變化常常是促成理論反思的驅動力，但並不會直接轉化成理論。任何理論建構必然是社會的產物，然而，一個特定理論能否被視為「重要的」，最終還是得由學術領域內的關係來決定；外部的政治力量僅在能夠影響學術圈內的權力關係時，才有因果關係上的效力 (Collins, 1998: 51, 622-23; Waever, 2011: 102)。

以此為基礎，Waever 也達到從互動過程與權力關係來解析 1954 年研討會的成果，若是停筆於此，他頂多能夠得到與 Guilhot 類似的結論：以 Morgenthau 為首的現實主義者以組織研討會與發表文章的方式，與理論對手展開對話；藉由獲取更多的資源（透過 Thompson 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長期資助），打造堅實的組織性基礎（掌控大學中的教學單位，訓練博士生，提供教職，建立研究中心，出版學術期刊與專著）；目的在為國際關係研究取得在強勢的行為主義陣營外相對獨立的學術空間。但若要更深入地探索 Morgenthau 在研討會中發言的「意義」，尤其是與理論相關的部份，就得求助於重建行動者意圖 (intention) 的「語言－行動」理論。⁶

Quentin Skinner 主張，為了理解作者在寫作文本時的真實意圖，必須將文本 (text) 置於寫作時的整體理論與學科背景脈絡 (context) 之中來考察 (Skinner, 2002: vii)。Skinner 的方法並非一般所認為的由「外部解釋」為主的「脈絡主義」 (contextualism)，他的重點在於「文本」，企圖理解一

⁶ 雖然 Waever 在此處偏重 Quentin Skinner 的政治思想史方法，但是他早在 1998 年就與 Barry Buzan 等合作，以 John L. Austin (1911-60) 的「語言－行動」理論為基礎，建構了安全研究領域重要的「哥本哈根學派」(Copenhagen School) 與「安全化」(Securitization theory) 理論 (Buzan et al., 1998)。

個文本嘗試對其他文本產生的影響 (Holden, 2002; Waever, 2011: 103)⁷。但是，此處所謂的影響又不是實際產生的效果 (perlocutionary effect)，而是作者意圖傳達內容的整個行動 (illocutionary force)，這就包含對意圖與目標的完整理解 (Waever, 2011: 123)。Skinner在研究「表述」(utterance)時，並非將之視為一連串的「命題」(proposition)，而是論爭(argument)；由於是論爭，必定預設了對立論點的存在。所以它是一個對話的過程，而我們即可從中理解作者企圖透過語言行動 (speech-act) 所希望達成的目標 (Skinner, 2002: 115)。

接下來讓我們以 Morgenthau 為核心，對研討會逐字稿進行分析。將這個文本視為一個語言行動，預設了它是一個對話的過程，除了顯而易見的與會者之間的對話外，至少還存在三個不在場的預設對象：其他社會科學學者、外交決策者與執行者、掌控學術資源分配權力者。由於研討會不對外開放的性質，逐字稿必須與 Morgenthau 的其他文本一起，視為一連串行動構成之整體來分析；而這一行動的整體必須置於特定的美國社會科學學術脈絡中考察才有意義。

關於與學術資源分配者的對話，涉及學科的制度性發展，Guilhot 的分析已經十分詳盡，並提供了我們所需的學術脈絡知識，此處便不再重複。與外交行動者的對話方面，由於這個研討會便有外交官在場，使得對話文本更具有互動特色。四位外交與國防官員 (Bowie, Fosdick, Nitze, Rusk) 都是現實主義者，但從 Morgenthau 對他們提問的回答中，我們感受到的不是平和的解惑與引導，更不見同好間交流應有的委婉。相反地，不論是修辭 (Skinner, 2002: 182-184) 或構句，都是在與立場相左的對手爭辯。在討論現實主義的理論如何對外交政策提供指導時，Wolfers 只是提到了「只要我們討論的是行為，就不會有大問題」，Morgenthau 立刻反駁道「那麼意義就蕩然無存了」，接下來便拒絕再發言，導致這個主題的討論草草結束 (Guilhot, 2011: 255-56)。這種強勢而直率的「論戰性格」，在整篇逐字

⁷ Waever 特別提醒「文本」與不對外開放的研討會逐字稿之間有所差異，所以他的分析限制在瞭解與會者如何看待及因應現實主義面臨的挑戰 (Waever, 2011: 101)。

稿中隨處可見。Thompson (1955) 嘗試將 Morgenthau 與 Wolfers 在研討會中的意見相左誇大為現實主義與行為主義立場之間的論戰，也可以視為師承自 Morgenthau (Guilhot, 2011: 145)。其重要影響是，在現實主義以論戰模式挑戰理想主義及回應行為主義的威脅，成為眾所皆知的有效策略後，晚近的不同觀點自然會以發動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或建構主義的論戰（不管是否得到回應）來做為引起學界重視的優先策略。再加上國際關係研究似乎特別容易受到國際間重大事件的衝擊，如兩次大戰、冷戰開始與結束、石油危機、全球化、與中國的崛起等，往往導致對主流理論的攻擊與修正。這些都促使論戰性格內化成為學科的性格。正如上文論及第一次論戰時提到的，被 Carr 直接批判的理想主義者中，就包含在兩次大戰中推動威爾遜主義和平運動的外交人員。因此，雖然理想主義已經被打敗，Morgenthau 等人仍將理想主義以現實主義對立面的方式提出，似乎是要再度指控理想主義在外交上的實踐，帶來了綏靖姑息的外交政策，造成希特勒無限膨脹的野心侵略，帶來生靈塗炭的殘酷殺戮。現實主義既然能深刻地洞察理想主義的缺陷，並揭示權力政治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自然具備了代表這個學術領域的正當性，而外交決策者更應該多諮詢現實主義學者的高見。這些表述顯然有強化現實主義地位的意圖。

然而，Morgenthau 自信而倨傲的表象之下，卻隱隱透露出某種不確定感。以戰勝理想主義姿態宣稱現實主義等同於國際關係研究的 Morgenthau，已經準備投入另一場戰鬥，這次他的論爭對象是行為主義陣營的學者。他以嚴峻的態度示警道：「現今最大的憂患，是美國社會科學界愈來愈偏向於採用一個特定的科學判準。任何使用這套科學術語者，就被承認為社會科學，或是被納入社會科學的概念架構中；反之，則被視為是不科學的，地位較低的研究。這種將理論與特定的社會科學等同的趨勢，已經阻礙了理論的進步，並削弱了人們對國際關係研究的普遍關注。」(Guilhot, 2011: 257) 即便行為主義一詞出現的頻率並不高，與會者卻似乎無時不被它鬼魅般的身影圍繞著。折衷主義色彩較強的 Wolfers 表現得較自在，認為 Morgenthau 太過狹隘，自我防衛過度，William Fox 似乎也有同感。令人好奇的是，從 Morgenthau 的發言中，我們除了知道這個以自然科學為範本的

判準解決不了道德的兩難問題、對行為的研究不能提供意義的瞭解外，並沒有清晰的線索指向他所提供的替代方案。與會的學者中，Morgenthau 與 Niebuhr 一向被視為與國際關係「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 較接近的學者：偏重歷史而非當代、規範性而非科學性、哲學取向而非方法至上、抽象原則而非具體政策。但這些理論特色卻未在研討會中進一步開展，遑論進行系統性的理論建構。Niebuhr 聲稱理論是「一般性法則 (general laws) 的建構」，而 Morgenthau 則指出「較深刻的恆常性」(deeper constants) 與可經由經驗地觀察而得到的規律性 (empirically observable regularities) 有所差異，但兩人都沒有提出較完整的論述。當 Morgenthau 企圖為所謂的理论性法則 (theoretical laws) 進行具體說明時，他似乎滿足於列舉幾項彼此獨立的法則 (laws)，如「永遠不要與較強的國家結盟」等，令人聯想到日後他於第三版的《國家間政治》中所提出的現實主義六原則 (Morgenthau, 1960 [1948], 3rd ed.)。Waever 認為，現實主義之所以採納了規律性 (regularity) 與重複性 (repetition) 這種趨同於行為主義的理論定義，正是受到在研討會舉辦的這個特定時點設定的對話者所影響。由於行為主義在美國學界強大的影響力，及其擁有界定科學地位的權威，迫使現實主義者在表述的過程中接受了既定脈絡中的常規 (convention)，而此舉則為現實主義本身的哲學基礎帶來了破壞性的後果 (Waever, 2011: 116-19)。

肆、關於理論的理論

那麼，Morgenthau 想要建構的究竟是什麼樣的理論？我們在他為研討會事先寫就並傳閱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 (Guilhot, 2011 : App. 2)。對他而言，國際關係理論就像是一張地圖，它並不能提供國際政治全景在特定歷史時點的完整描述，而是表現了不受歷史變遷影響的地形輪廓。他進一步闡明，國際政治的經驗性現實與國際關係理論之間的關係，就像同一個風景的照片與繪畫之間的差異。照片顯示了任何肉眼可見的細節，繪畫無法將這些細節加以呈現，但它忠實反映了畫家的個人特質 (p. 265)。這樣生動的譬喻固然極為高明，卻對後學沒有太大的幫助，因為沒有人知道如何

從中發展出系統的理论原型，甚至Morgenthau自己也沒能做到。要等到四分之一世紀後，才由Kenneth Waltz將這個難題解決⁸。Waltz完成了Morgenthau未竟之志，將現實主義從哲學的形式改造成具有現代意義的政治理論，並徹底與實證主義分離 (Waever, 2011: 118)。這事實上要求從科學哲學 (philosophy of science) 的角度對理論進行解析 (Waever, 2009)。如上文所述，理論與法則之間的差異並未在研討會中得到令人滿意的處理，於是Waltz便從這個最根本之處展開切割現實主義與實證主義的工作。對他而言，理論與法則不可當成同義語互換使用，理論也不是一組法則的集合，理論這個名稱應保留給具有解釋能力 (explanatory power) 的理念架構。理論也不可能經由簡單地累積假設來產生，即便是經過嚴謹地驗證的假設，抑或假設之間確實彼此相關 (Waltz, 1979: 5)。Waltz關於理論的基本立場直截了當地拒斥了實證主義的歸納假象 (inductivist illusion)，跳過整整一個世代誤解了理論本質的現實主義者，直指Morgenthau思索的本質意涵。理論包含理論性概念 (theoretical notions)，這些概念不是「被發現的」，而是「創造出來的」。理論性概念與由其建構而成的理論，通常必須與「現實的世界」有很大的差距，以求得到更廣更適切的解釋力。因此，理論性概念不是由「精確」 (accuracy) 與否來檢驗其是否為「正確」或「錯誤」的概念，而要看它是否能讓使用它的理論更加完善，亦即有助於「解釋」，而非「複製」外在世界 (Waever, 2009: 205)。

對Waltz而言，理論是「一種心智建構的圖像，它描繪一個限定領域內的行動。理論就是對這個行動領域的組織以及各組成部分之間關係的描繪」 (Waltz, 1979: 8)。由「心智建構的圖像」這個概念的選擇，可以看出他對理論建構者個人創意與風格的強調，它包含了三個要素：首先，對天真的現實主義取向的批評。理論並非現實，理論創造了現實，而且理論不是永恆的真理，它隨時可以被更新的理論所推翻。其次，由累積實證資料來

⁸ 本文之所以將理論探討限定於 Morgenthau 與 Waltz，除了兩人都是現實主義傳統中最重要理論家外，還有這個人們較為陌生的科學哲學傳承關係。經由對兩者反實證主義認識論立場的澄清，本文從批評論戰敘事模式模糊了國際關係研究核心主體開始，到回歸理論本質初衷的一貫性得以保持不致失焦。

形成理論是不可行的。理論既非某種累積性的實證主義成果，亦非來自嘗試—錯誤（*trial and error*）的過程，而是來自傑出非凡的直覺，是創造性的概念。最後，理論的確定形式因創建者而異，因此無可避免地帶有個人洞察性的不同特徵（*Waever, 2009: 206*）。在傳統的邏輯經驗論（*logical empiricism*）的科學哲學架構下，科學的理論被理解為一個解釋性的、正式的、定理式（*axiomatic*）的系統⁹。理論的定理原則上只可能是對的或錯的陳述（*statements*）。理論的詞彙與經驗的詞彙是由相關性規則來確認。此外，至少有部分的理論定理（*axiom*）是以法則（*law*）的形式呈現，被理解為具有普遍性的一般化（*universal generalization*）。因此這種科學的理論之結構是一種定理式的、演繹的（*deductive*）系統。1970 年代之後，新的科學哲學取向將理論視為「模式」（*models*）的集合。與前述將理論視為一組理論詞彙與經驗世界之間關係的清晰定義之陳述大相逕庭，此處理論的核心是模式。理論性概念是在模式中被定義的，而原則（*principle*）只能從它們與模式之間的關係來理解（不再預設普遍性的存在）。理論的檢驗，不再是考察理論陳述相對於經驗世界的真實性，而是評估模式原型（*prototype*）與所設定的條件狀況之間的近似程度（*Waever, 2009: 206-207*）。

Waltz 的理論圖像，就是此類在系統層次上的結構，一種與實證主義不同的概念組織形式，它體現了無法被直接觀察的關係。這個理論建構自然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與國內政治相關的研究提供了三個主要的結構主題：一是原則與層級（*hierarchy*），二是不同政治行動者的功能與權威，三是相對的能力（權力）。其中第一點是最基本的要素，其開展受到第二點的形塑，而整個過程則進一步由第三點界定其內涵。國際關係的結構也與此類似，但將第二點的內容排除，因為國家即為最基本單位，支配性的原則為無政府狀態，國際環境中能力的分配就以極化（*polarity*）的現象呈現。因此，國際關係的結構只有兩個組成部分，而極化現象界定了無政府狀態的表現形式。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理論的應用，即從無政府狀態的基本概念中擷取在特定情況下對行動的一般性預期，並描述不

⁹ 此處 *Waever* 主要參考了 *Suppe*（1977, 1989）與 *Giere*（2006）的著作。

同極化結構的特徵，接著將無政府狀態的行動導入每個特定極化結構進行分析 (Waever, 2009: 209)。從對「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貢獻。現實政治 (*realpolitik*) 或權力平衡被視為準法則式的原理，是因為它在近代歐洲歷史上如此頻繁地出現，使人們幾乎相信這是不證自明的規律。而 Waltz 的理論則能夠從結構的視角切入，提供「為何」權力平衡的手段會被反覆使用的解釋；與此成對比的古典現實主義研究，則集中在說明使用這種手段的「後果」。Waltz 強調，在任何時地，只要出現了兩個條件（也只需這兩個）：體系為無政府狀態、體系中的單元以求生存為目的，權力平衡政治就會成為支配性的現象 (Waever, 2009: 210; Waltz, 1979: 121)。

Waever 對 Waltz 的理論地位有如下的評價：1979 年《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書的出版，迫使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接受結構現實主義的核心預設：無政府狀態與國家自利性，同時也使其積極建構同樣精簡的理論。然而，在結構現實主義陣營的學者，卻因無法超越 Waltz 的理論高度，停止了與理論本質有關的思考，反而集中精力在理論的應用上，導致結構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趨同。兩者都傾向於以微觀經濟學為基礎的理性主義方法論取向，連帶造成了理性選擇方法的流行。結果就是 1980-90 年代出現的「理性主義／反思主義」(rationalism/reflectivism) 對立 (Waever, 2009: 214-15)。正如國際政治結構的力量將無可避免地作用於單位（行動者），Waltz 自己的理論也難逃這個宿命。即便在著作中如此明顯表現出反實證主義的意圖，Waltz 的理論還是在美國國際關係領域的結構力量（也是當初 Morgenthau 所奮力抗拒的）作用之下，被詮釋得面目全非。大多數自稱現實主義的學者，只是片段地摘取《國際政治理論》中的概念，繼續以實證主義的方法論來進行研究。

伍、結論

Waltz 曾明白地宣示，他的理論並非實證主義的理論（Waeber, 2009 : 201）。雖然對 Morgenthau 的各種批評是他理論建構工作的起點，但就科學哲學的層面而言，在理論最核心的本質上，也就是關於理論的理論之立場上，從 Morgenthau 到 Waltz 是一脈相傳的。他們的理論建構工作，持續地挑戰支配美國學界的實證主義傳統，及其衍生出的行為主義方法。透過修正主義對學科歷史的批判與重建，我們發現源自啟蒙時期的樂觀科學理性主義，不僅是實證主義的先驅，也是支撐了帶有線性進步史觀的論戰敘事模式的基礎。主流的學科發展史不只存在當下主義謬誤，更是企圖營造學科存在某種一致性與共識印象的保守論述，藉此掩飾了特定爭議的重要性。Morgenthau 與 Waltz 對理論的立場與對實證主義的抗拒，就是主流論述書寫者極力想要抹去與竄改的事實。國際關係研究，或更廣義的社會科學領域，似乎再次認識到，人的理性有其限制，對經驗世界的認知永遠不可能是客觀而與價值無涉的。2013 年《歐洲國際關係學刊》（*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推出一期特刊來討論國際關係理論的未來，正揭示了理論研究重回學科研究議程的重大轉變。

參考書目

- Banks, Michael. 1984.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Banks, ed. *Conflict in World Society: A New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21. Brighton: Harvest Wheatsheaf.
- Baylis, John, Steve Smith, and Patricia Owens. 2011.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76. "Le sens pratiqu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février, No. 1, pp. 43-86.
- Butterfield, Herbert. 1959.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London: G. Bell & Sons.
- Buzan, Barry,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1998.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Carr, Edward H. 1939.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mpany.
- Clark, Ian. 1989. *The Hierarchy of States: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Randall. 1998.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 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 Cambridge: Belknap.
- Donnelly, Jack. 1995. "Realism and the Academic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mes Farr, John S. Dryzek, and Stephen T. Leonard, eds. *Political Science in History: Research Programs and Political Traditions*, pp. 175-9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ere, Ronald N. 2006. *Scientific Perspectiv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uilhot, Nicolas. 2011. "The Realist Gambit," in Nicolas Guilhot, ed. *The I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28-61. Cambrid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uilhot, Nicolas. 2015. "Portrait of the Realist as a Historian: On Anti-whiggism 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1, No. 1, pp. 3-26.
- Hellmann, Gunther, ed. 2003. "Symposium: Dialogue and Synthesis in Individual Scholarship and Collective Inqui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1, pp. 123-50.
- Holden, Gerard. 2002. "Who Contextualizes the Contextualizers? Disciplinary History

- and the Discourse about IR Discours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8, No. 2, pp. 253-70.
- Holsti, Kal J. 1985. *The Dividing Discipline: Hegemony an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Boston: Allen & Unwin.
- Kahler, Miles. 1997.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fter 1945,”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20-53.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Kaplan, Morton A. 1966. “The New Great Debate: Traditionalism vs.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19, No. 1, pp. 1-20.
- Knorr, Klaus E.,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1969.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ugler, Jacek. 1993. “Political Conflict, War and Peace,” in Ada W. Finifter,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I*, pp. 483-509.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Kuhn, Thomas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pid, Yosef. 1989.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pp. 235-54.
- Lijphardt, Arend. 1974.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Great Debates and Lesser Debat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26, No. 1, pp. 11-21.
- Maghroori, Ray. 1982. “Introduction: Major Deb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ay Maghroori and Bennet Ramberg, eds. *Globalism versus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rd Debate*, pp. 9-22.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Morgenthau, Hans J. 194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Puchala, Donald J. ed. 2002.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sessing an Academic Field*.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Quirk, Joel and Darshan Vigneswaran. 2005.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difice: The story of a First Great Deb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1, No. 1, pp. 89-107.
- Schmidt, Brian C. 2002.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22. London: Sage.
- Skinner, Quentin. 2002.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1: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cking, George W. 1965. “On the Limits of ‘Presentism’ and ‘Historicism’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Journal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 1, No. 3, pp. 211-18.
- Suppe, Frederick. 1977. "Afterword," in Frederick Suppe, ed.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2nd edition, pp. 615-730.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uppe, Frederick. 1989.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heories and Scientific Realism*.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Thompson, Kenneth W. 1955. "Toward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9, No. 3, pp. 733-46.
- Waever, Ole. 1996.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pp. 149-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ever, Ole. 1998.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pp. 687-727.
- Waever, Ole. 2009. "Waltz's Theory of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No. 2, pp. 201-22.
- Waever, Ole. 2011. "The Speech Act of Realism: The Move That Made IR," in Nicolas Guilhot, ed. *The I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97-12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 Waltz, Kenneth N. 1997.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pp. 913-17.
- Zacher, Mark W. and Richard A. Matthew. 1995.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 Divergent Strands,"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pp. 107-5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Debates Nar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ing-sheng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Quebec at Montreal, CANADA

Abstrac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y tends to narrate its history in terms of “great debates.” This narrative is by no means uncontroversial. This paper will question this dominant historiography of the “debates,” with the help of theories from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We will then turn to the founding event of the realist school in 1954, and reveal the realists’ struggle for the disciplinary autonomy and a specific theory by assessing the conference transcript. Finally, the main emphasis will be on the nature of theory by linking to Waltz’s structural realist theor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field, speech-act, philosophy of science

